

中国发展的文化自觉:人文经济学之引入

魏鹏举

摘要:以发展经济学观照“中国模式”,其所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具有三个指向,即追求最广大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现代化、基于全民社会均衡福利的经济社会化和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应从文化经济学视野,反思和纠正韦伯判断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结合东亚奇迹的价值观有效性,建立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在当代态和历时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到中国的内生人文经济学的系统性分析发现,“以人为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以贯之,中国始终秉持着“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具体在当下就是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人文经济学;文化强国;中国道路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3.05.003

202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①从现代市场经济增长的意义上讲,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具有了一般市场体制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些普遍性特征,如市场化配置资源效率提升、民营企业产权激励生产率提高、金融市场繁荣带动投资旺盛、开放统一国际市场体系保障贸易畅通发达等,但“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已经被充分感知并得到广泛讨论,比如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形成的市场稳定效应、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带来基建的高效与红利、庞大人口有效组织迸发的巨大生产活力、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并快速实现脱贫,等等。那么,“中国模式”在何种意义上是有别于其他社会经济体发展模式的独特类型?这种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推广的稳定性与普适性?

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特定视角去梳理当代具体实践的“中国模式”所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并借助文化经济学的学术视野,将“中国模式”放在具有显著连续性的“中国道路”历史传承发展系统中,探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内生动能;进而以人文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检视中国发展道路,人本主义总体特征与基本导向、“人文化成”和平发展观、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质性内涵就连贯明确了。

一、发展经济学视角:以人的全面发展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不能仅仅是若干特色实践经验,也不是若干有效政策效应可以概括的^②,应该是具有一个内生价值内核的有机发展体系。相对于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更适合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与理解。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讨经济体的总量增幅及其结构、动力等问题,而发展经济学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做统筹性相关性的整体研究。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探讨市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与北京文博文创提质增效模式研究”(21ZDA07)。

作者简介:魏鹏举,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 100081; weipengju@126.com)。

① 《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人民日报》2023年7月10日,第1版。

② 梁建章:《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我们要讲中国模式,就必须把真正独特的政策找出来:中国的确有很多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使得中国成为经济政策的实验场,其中的一些经验很值得总结和研究,让全世界分享。……如果把正确的经验总结出来,就是中国模式。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440540251644401&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3年7月19日。

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量问题,前提是市场本身已经比较成熟稳定,而且假定经济发展是相对自治和独立的进程。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定领域,比如货币金融、资本市场、进出口贸易等,有其适用性和解释力。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模式,而且,国有企业作为关键市场主体并非以经济利润计算的一般经济人,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发展、财富配置等核心经济问题往往直接融入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建设等国家治理体系中。发展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特征、态势等总体性问题更为适应和有效,不过,这也需要将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度结合,才能真正有理论解释力和学术探索力。

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当代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看出“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体的最显著特征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诉求。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点可以明显识别:

1. “中国模式”是追求广大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现代化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格管控的计划经济体系逐步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转型,在总体上以公有制兜底社会经济安全与民生底线的同时,逐步释放并激活全社会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从而实现了前30年(2010年前)国民经济产值保持两位数超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这种转型在社会发展层面的诉求表现为,动员举国力量,尽快实现总体上的精准扶贫脱贫,稳健推进乡村繁荣振兴,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来推进。

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进而主动开展高质量转型的“中国模式”,在这个跌宕起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潮中有一条核心主线,那就是追求并保障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无论是高速度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最大多数民众价值的实现及其利益最大化是其中的主基调和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要举措,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更多人富裕,同时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保障了中国经济在超高速发展进程中的稳健,国力的迅速提升也为基本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创造了优越条件,这也为中国经济总体高速而健康的成长营造了优良环境。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改善的良性循环,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人民,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与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提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条件约束越来越吃紧的时点,中国政府果断提出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战略性决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最近十年来进入着力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升级发展、优化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品质、充分保障基本民生、推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等高质量高水平导向的新时期。

“发展是硬道理”,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这个“硬道理”并非绝对经济增长意义上的,而是通过发展来保障中国这个庞大人口国家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权,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这是“中国模式”的“硬道理”。

2. “中国模式”是基于全民社会均衡福利的经济社会化

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阿马蒂亚·森享有“经济学的良心”赞誉,他的发展思想直接影响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体系架构,他对于“中国模式”的分析卓有成效并影响深远。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分析“亚洲奇迹”时认为,这“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他在分析中国的发展现象时很有创见地提出,中国改革后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改革前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无意造成的正面后果”,“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①。这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超高速经

^①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贇、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260页。

经济增长并非全部来自经济制度变革的效应,其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前因及后果,其实根基都在以最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圭臬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上,这才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发现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受益于并非精心设计的全民普惠福利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与系统能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提升最广大人民社会福利水平的内生动能也就顺理成章了。“中国模式”之所以成立,之所以有别于欧美模式或者东亚模式,所谓大政府、强干预、重基建等其实都是“中国模式”核心精神的衍生现象或表层特征。“中国模式”的精神内核从文化传承与人文价值谱系的深度分析在后文会专题开展,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所引发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如果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将各种特征性鲜明的表征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制度重大变革前后70多年的整体发展格局中来统筹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所有民众社会福利的普惠努力,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核心目标,这些其实是社会与经济得以良性协同发展的关键原因。

3. “中国模式”是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积极倡导和推进者,中国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全球发展互惠共享,“中国模式”不仅是中国内部发展模式,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互惠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近代百年历程充分说明,中国不能闭关锁国,只有积极开放,以有容乃大的胸怀气度拥抱世界,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壮大,人民才会真正自由幸福。中国需要全球的市场、资源、资本、人才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国人民也需要在开放的世界中合作共赢、互鉴交流、学习提升、互通有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得益于全球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事实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生效应,而社会发展的具体表征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基本权益和价值诉求得到充分保障和有效满足。开放的国际环境,不仅给中国民众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也给了中国民众更广阔的获取财富的市场,这符合前述“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模式”得以成功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以经济全球化来认知“中国模式”,是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之间共生共荣关系的着眼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同样,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繁荣方面,目前中国和世界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和则两利,分则俱损。这种深度共融共生关系,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在整体上的产业链合作,更具体入微地存在于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消费者、学习者等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必然影响到中国乃至全球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民生福祉,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合作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国际合作。

将“中国模式”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精神的当代赓续。“中国模式”简单说就是民生为大,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立场。《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以天下治平为担当、以民生幸福为己任的超越性士人精神。传统的天下意识其实就是今天超越家国范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切,这种天下大同理念让中国人相对于国家权力更重视人民广泛认同的治理体系,这也就是“中国模式”的超国界价值来源。

发展经济学是一种较适合分析中国当代发展现象的学术工具,可以有效解释“中国模式”在当前全球经济体中的独特性。不过,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中国模式”所隐含的历史逻辑与文化遗产还有待从文化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去做系统的辨析和探讨。

二、文化经济学视野:从历史纵深贯通“中国道路”

对于当代“中国模式”的深入认知,需要深刻理解历时态“中国道路”发展演进的大格局与大视野。

文化经济学是一种探究社群价值系统与财富价值系统之间关联互动的学术视野,整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的文化与经济研究、中观的文化产业研究以及微观的企业文化研究^①。对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观察与探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启发性的学术工具,借助这样的学理系统,在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经济观偏见的基础上,检视亚洲价值观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回归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本土文化基因探源,有助于树立中国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觉。

1. 韦伯判断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②

在关于文化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这个宏大命题的研究方面,马克斯·韦伯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被称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圣经,因为他的研究证明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发生并发展自欧洲,是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无论印度还是中国,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曾长期辉煌过,一旦缺乏这种独特的文化土壤,都不适宜甚至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韦伯的这一系列判断,由于其研究很系统,有立也有破,因此在学术场域中很受追捧。尽管很多中国学者对韦伯判断不认同,但总体上并没能学术上真正对韦伯判断形成挑战。比如余英时先生用大量历史文献说明中国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士商融合^③,而且有蔚然成风的趋势,但余先生没有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儒家文化能适应并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韦伯判断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一方面是将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经济增长效率变革乃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出现视为“天然”的全球先进生产力代表,另一方面是用欧洲文化的价值标准来度量中国或印度的文化体系,以此来判定是否能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先进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经济”决定论,本身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就缺乏观照,况且还因缺乏对于特定文化传统的细致研究而流于偏颇。比如,马克斯·韦伯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聚焦在儒教和道教,但韦伯对这两个学说体系研究深入程度的不足,以及对法家思想等其他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忽视,使他无法真正触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症结,比如商业流通长期受到来自皇权的抑制。

2. 东亚奇迹与亚洲价值观

对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经济说进行了有力反驳的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在市场经济领域的飞跃式发展。在二战的废墟上,日本经济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狂飙突进,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16%,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11%,1968年就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1978年超过当时的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引领下,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四小龙”也随之崛起,80年代之后又有“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接力经济振兴。东亚地区现代市场经济跨越式发展在当时就引发类似“东升西降”的讨论^④,在经

① 魏鹏举:《建构基于文化价值坐标的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8—25页。

② 蔡之兵:《终结“历史的终结”,什么是中国模式?》的探讨颇有启发性。他认为,相比之下,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拥有“政府与市场的二分结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资本要素并不具有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对市场和政府的影响力,更无控制或改造政府的能力。……政府与市场的这两大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https://weibo.com/3604378011/Lb3YDdM9K>,访问日期:2023年7月19日。

③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

④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R. 纳尔森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中谈到全球范围内的对于“国家创新体系”问题的关注时,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自70年代初以来,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增长放慢,日本作为一个主要经济和技术大国迅速崛起,美国相对衰落,欧洲落后于美日两国,这些问题备受人们关注,从而导致出现了大量涉及和支持本国技术创新力方面的文章和新政策。同时,随着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在有些领域参与企业竞争的国家增多了,而在过去,这些领域只是由很少国家把持着的。其他现在在制造业还弱小的国家也在考虑如何仿效这些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理查德·R. 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汤光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第312页。

济学管理学方面也产生了东方化的建构,比如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the flying-geese model)进入现代经济学体系,以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为标识的日本式管理也成为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补充。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的奇迹》报告,提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些都表明,东亚这个特定的区域,虽然在文化或宗教传统上迥然有别于西欧,但是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东亚奇迹何以发生?是源于欧美资本、市场、贸易等的外生增长,还是基于自身的创新累积、本土文化支撑的内生增长?从文化—经济内生发展维度解读东亚奇迹的代表性观点,是由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这个理论认为,东亚区域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其共享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如勤俭和诚信的伦理准则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崇奉集体主义、尊重权威、选贤任能、重文教这些价值理念与威权制度融合促进了国家的整体发展,等等。

东亚模式及其亚洲价值观树立的文化自觉,向世界宣示儒家文化圈近代危机的原因已经消除或正在消退。然而,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衰退使其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全面倾向西方经济学思路。中国的整体崛起及其稳定健康的自主发展模式成为真正另辟蹊径具有深厚文化传承底蕴的“中国道路”。

3.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

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实践来看,民生为本的“中国模式”是成立的,那么这种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是制度性变革带来的无意识积极后果(哈耶克意义上的),还是有着深厚的内生文化动能的长效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是否可以有效树立起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道路”自信?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效用,这是深刻理解“中国模式”的必然要求。中国官方对于“中国模式”的规范说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国特色”基础与源流就是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把握,按照“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在新时期,要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必须回归到中国文化遗产与发展上来,只有如此,“中国模式”才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国模式”才能继往开来走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性,同时也有全球价值的“中国道路”。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有着显著的历史一贯性,这个有着深厚内生文化动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曾经被忽略或遮蔽。不仅仅是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的不作为或有选择作为,我们国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或局限,片面解构甚或完全否定中国按照自己的传统可以开拓出现代经济发展之路的可能性。比如,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中国文化经济观是农耕文化及其相应的经济特征理论,宣称中国就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农业经济既是中国小农文化的原因,也是结果。毫无疑问,这里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忽视中国源远流长的工商业历史及其相关文化价值体系。如果仅有农业传统,如何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史上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量及其养活的人口都居全球前列,如何理解在转向改革的30多年(1978—2010)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了14倍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先秦时期,包括农工商的多元经济发展格局就已经比较成熟稳定,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积极入世治世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始终有着对于国民财富创造、社会合理分配、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等积极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承,这些文化经济观念同样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在开放发展环境中其积极作用会更为发扬光大。

文化经济学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新视野,不仅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一元模式拓展到“亚洲价值观”乃至“中国道路”的多元格局,也更有效地坚定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探索

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过,关于中国发展的模式与道路的探究,不仅要明白它“不是什么”“因何而来”,更要做深刻的“是什么”“要如何”的实质认知分析。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与文化价值传承的人文经济学,对于从本质上理解和探究中国发展道路会有特别的启发性和洞见力,这也是某种意义的“反者道之动”。

三、人文经济学启悟:“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

当前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个偏颇的发展态势就是数量化分析,某种程度上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把经济问题作为自然科学的客观化对象进行物理性分析,这种取向最大的问题不是量化研究是否合理,而是超社会、去伦理导致的经济发展价值偏离。人文经济学试图对现代经济学研究作纠偏,强调经济增长的人本主义约束,将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文经济学导向,如果做一个历史性回归分析,就能很清晰地发现,和那种衍生自西方学术传统以个人主义及其价值追求为内核的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式的人文经济学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回归民生的本质,追求的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突出文化传承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赋能的内生活力及可持续发展。

1. 以人为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以贯之

在现代经济走入增长泥潭、资本变成社会异化怪物之际,回归人本主义是有良知的经济学摒弃所谓“不道德”客观立场而拨乱反正的努力。何为人本主义?不同的文化价值传统在理解上会有较大差异,比如欧洲哲学传统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而存在的概念,是二元结构下的个体价值彰显,中国传统的人本则是突出社会整体性的人民价值,孔子的“庶富教”就是一个简要但影响深远的中国式人文经济思想的综合表达。

《论语·子路》讲了一个师生讨论国家如何治理的故事。弟子冉有陪同孔子到了卫国,先生赞叹此地人口繁盛(庶矣哉!),冉有讨教:“如何更好地治理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呢?”孔子直截了当地说:“富之!”弟子追问:“如果富裕了以后又该进一步做什么呢?”先生笃定指出:“教之!”这个故事很生动地道出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治国安邦之人文经济思想。首先,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其次,国家要通过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富足生活;接着,国家发展的更高层次是精神文明发达。即国家发展要以人为本,基础是要努力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富裕,更高的追求是人文昌盛的美好生活。

孔子“庶富教”的整体人文经济思想言简意赅,体现了原典儒学的总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也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理想“道统”内涵。儒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孟子的经世济民主张基本上和孔子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在他所谓的“明君制民之产”^①,也表现在循“人性善”而施“仁政”的理想精神方面,这即是孔子所推崇的富之后“教”。荀子也特别强调善治的重要表现就是人民安居乐业,《荀子·荣辱》有云:“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不过荀子持明确的“性恶”论,对于社会教化更强调自上而下的规训。儒家总体上都重视经济繁荣与人文昌盛之间的良性交互作用,经济发展让人民安居乐业,而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更高阶,财富创造与配置的底线是不能突破人道主义基本原则,这就是所谓“义利之辨”。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不缺席,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最富正当性的社会主流价值。

虽然“汉承秦制”,法家式的皇权专制在经济领域很强势,但由于儒家思想已成社会主流价值,所以民生经济还是在道义上得到有力支持,这样的情形在历代王朝大抵如此。《盐铁论》是中国古代比较

^① 《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完整的一部反映专制王朝经济观念的重要文献,它记录了汉昭帝(前81年)时期一次重要的经济政策辩论。代表儒生的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这个辩论之后,作为妥协,官方暂时取消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

2. “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社会价值系统中,经济发展是理想人文社会演化的有机内涵,“人文化成”的实质就是人文价值共享经济利益的和平发展模式。如前所述,先秦儒学三位代表人物的国家治理理想都把人民的经济利益实现作为达至礼乐文明社会的题中之义,之所以社会最终形态是文治教化,是因为这些先哲深知,缺乏价值共识的社会不可能是和平的社会,更不能称为美好的社会。中国历史的稳定连续,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这一切美好都离不开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内生价值能效。尽管中国的历史从不缺少战争,正如我们的史书所罗列的,但切不可无原则地合理化甚或美化这种人类的灾难,或许有些战争有“破坏式创新”的客观作用,但和平与发展才是永恒的人类社会良性演进主题。战争与对抗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如今世界,即便是血肉热战不那么频繁,但政治阵营对抗的冷战、文明冲突的仇恨却变得日益复杂多样。中国漫长历史中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结构性的社会群体性对抗时有发生,但以大历史视角来看,由于共同的文字、相似的生活方式、基线的人文价值等文化因素,中华民族整体实际上日益壮大且凝聚力与认同力不断增强。如今西方社会由于利益阶层化、文化族群化、政治阵营化,社会撕裂问题日益严重。西方这些社会问题的对立性观念症结,曾经随着西学东渐也在中国社会有所滋生,但鉴于中国强大的传统惯性,尤其是这些年不断增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理念正在给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带来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人文经济正能量。

文化这个现代世界最复杂的词汇,在中国文献体系中可以追溯的源头是孔子注解的《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上下文看,文化对应的是自然天文变化,是人的能动性彰显。文化在这里有从文到化的两层递进含义,第一层是“文明以止”的人文涵养,第二层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成进程。“文明以止”被程颐训为“文明而止”,“止”是达到之意,人文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文明形态。在孔子的知识体系中,他所向往的文明形态是周公治下出现的礼乐和谐有序的社会形态,恢复礼乐文明也正是他所毕生追求的社会目标和学术愿景。文化是孔子以礼乐文明理想实现社会和平发展的天下大同治理愿景,“化成”就是他说“庶富教”的人类共同体构建的有机扩展进程。孔子虽然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他所擘画的文明进程,但他的理想随着儒学的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而内化为中国社会普遍文化精神。中华民族虽经历劫难,但始终能以和合消弭仇隙、以和平改善民生、以包容促进发展,从不寻求绝对价值的同化,而是以人之为人的基线价值包容化合,以和气生财的人本理念实现和平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3. 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中国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其内核就是“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本体目标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现代文化普惠繁荣与创新发展,开放目标是以文化赋能整体社会经济的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文化强国的这种表述,尤其是考虑到“强”字可能带来的误解,在国际文化伦理层面上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因此特别需要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人文经济学的价值视野来阐发文化强国的内涵及其对于社会经济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文化发展主张是强调尊重各种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表达,不分先进落后,不论强与弱。中国提出的文化强国当然不是要在文化价值观意义上挑战这种国际共识,更不是要搞软实力对抗,而是有着深厚中国传统底蕴的自强不息内在价值追求的体

现,是具有深刻人文经济学内涵的美好生活愿景^①。如果把中国发展放在中华文明史来看,就能明白文化强国的渊源;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放在100多年的近代史来看,就会理解文化强国的民族诉求;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两个一百年”的新征程来看,就能认识到文化强国的高质量发展意义。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首要任务是做好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好“两结合”“两创”的文化当代化发展,坚守以人为本的发展精神,遵循“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能与人文价值,带动中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与世界在开放包容中实现共荣共生,为全球人文经济繁荣做“中国模式”示范和“中国道路”探索。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本质上是从基于GDP考核的经济增长为中心向注重品质提升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协同发展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现有的一些经济学专业观察和研究颇有启发性,比如许小年提出的“两个中国模式”的看法,特别强调相对于大政府强干预模式,分散多元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对于中国经济重回繁荣更有价值^②。但是,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实并不是经济领域自身的变革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机性调整和转型。并且中国需要探索内生于自身人文传统与经济伦理的发展道路,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才能使古老文明且人口巨大的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只有如此,才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合理认知和把握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和文化强国建设结合起来。文化强国建设其实内含着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赋能,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文化强国建设重要支撑也是其预期效用。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水乳交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特征和发展愿景,立足中国实践与自身文化遗产的人文经济学分析,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这种特征和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是基本事实,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特征及路径探讨的学术不适应也是基本事实,而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分析,不仅涉及是否能跳出欧洲中心主义并形成对这一独特发展模式的合理认识,更关乎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和路径选择。目前来看,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和中国历史传统发展路径,以回归中国文化价值谱系的人文经济学对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做整体性分析是值得重视的方向。本文只是一次理论性的尝试,尚待更加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索,以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troducing Humanistic Economics

Wei Pengju

(Institute of Cultural Econo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P.R.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70s, when China implemen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ts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over three decades of continuous and rapid growth, drawing global atten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phenomenon a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can constitute a "Chinese model". China emphasizes its own path based on its histor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known as the "Chinese soluti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model, and path of China urgently need to

① 魏鹏举:《文化强国战略的人文经济学内涵》,《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2023年6月6日,第2版。

② 许小年:《两个中国模式》。文章指出,要想经济复苏,必须先化解凯恩斯模式所积累的种种风险,这个过程在时间上可能不会太短。在清理了债务、过剩产能和银行坏账后,需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半段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亚当·斯密模式。……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重回繁荣完全是可以预期的。<https://www.mbachina.com/html/FMBA2012/202111/376535.html>,访问日期:2023年7月19日。

be located and deduced from the intrinsic realities and historical-cultural values. Drawing from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policies,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llows us to clearly see three directions inherent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for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universal social welfar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sociated with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which could be seen as the results of reform policies. Meanwhile, it also leads us to comb through China'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piritual ener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models like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cultur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system of China. Cultural economics becomes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tool for exploring the depth of China's development histo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ltural economics, we need to reflect on and correct the Eurocentric bias from Max Weber.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Asian value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e establish a conscious self-confidence in China's cultural genes and "Chinese solution" for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cultural economics for the historical China's developmental path, returning to China's intrinsic humanistic economics rooted in its own reality and history. As a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rules about cultur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evelopment, humanistic economics allows us to conclusively deduce that the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ing principles which put people first remain consistent throughout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Moreover, considering China's humanistic tradi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it has consistently upheld the "humanisation and civilisation" perspective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this translates into empowering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al advancement,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ffirming China's pursuit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Key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Cultural economics; Humanistic economics; Cultural power; Chinese path

[责任编辑:郝云飞]